

后人类主义视角下译者身份的消解与重生

杨海涛¹

(1.天津外国语大学, 天津 300302)

摘 要: 后人类主义批判人类中心主义, 强调人机融合与多元共生, 颠覆了传统译论中译者单一身份的认知。受翻译技术普及与全球化交流影响, 译者从翻译活动单一中心转变为多元协作主体, 打破传统二元对立。后人类主义下, 译者呈现“创译者”“协调者”等新身份, 兼具多重角色且动态调整。这推动翻译理论革新与实践优化, 也对译者素养提出更高要求。研究指出, 译者身份的转变是科技文化发展必然, 未来应聚焦新兴翻译领域及二者深层互动机制。

关键词: 后人类主义; 译者身份; 翻译实践; 人工智能; 翻译技术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7.1170

一、引言

后人类主义作为 20 世纪 80 年代兴起的学术思潮, 在学界影响力不断攀升。其源于对传统人文主义的反思批判, 旨在打破人类中心主义, 重构人与非人类关系。随着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前沿科技的突破, 人类生活、认知与自我认知面临巨大冲击, 后人类主义为审视人类存在、价值及与环境关系提供了全新视角。译者身份一直是翻译研究的核心议题, 从早期的“忠实仆人”到强调主体性、创造性, 其定位经历复杂演变。后人类主义的出现, 为译者身份研究注入新活力。它打破原文与译文、作者与译者等传统二元对立, 促使研究者重新审视译者在翻译中的地位与作用, 深化对译者身份多元性、复杂性的理解。在翻译实践中, 计算机辅助翻译与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 使译者与机器协作愈发紧密, 工作方式与身份也随之改变。后人类主义视角下的译者身份研究, 有助于揭示当代翻译活动新特征与规律, 推动翻译理论与实践创新。

二、后人类主义理论概述

2.1 后人类主义的起源与发展

后人类主义的起源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中叶, 当时科技的快速发展, 特别是计算机技术、控制论和信息论的兴起, 引发了人们对人类与技术关系的深刻反思。这些新兴技术使得人类对自身的认知以及对自身在世界中的地位产生了动摇, 为后人类主义的诞生埋下了种子。在早期阶段, 后人类主义主要体现在科幻文学与电影中, 类似阿西莫夫的《基地》系列。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 后人类主义作为一种明确的学术思潮开始兴起。这一时期, 以福柯、德里达等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对传统哲学中的人类中心主义、本质主义等观念进行了猛烈批判, 为后人类主义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福柯通过对知识、权力和主体的考古学分析, 揭示了人的概念是历史性的建构, 否定了传统的先验主体观念, 动摇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根基。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思想, 强调对文本和意义的开放性解读, 打破了传统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 为后人类主义打破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界限提供了方法论启示。与此同时, 自然科学领域的新进展, 也为后人类主义提供了现实依据。^[1]

在这一背景下, 后人类主义者开始从不同角度阐述自己的观点。唐娜·哈拉维 (Donna Haraway) 在 1985 年发表的《赛博格宣言》中, 提出了“赛博格” (Cyborg) 的概念, 即半机械人, 是有机体与机器的混合体。她认为, 随着科技的发展, 人类正逐渐与机器融合, 赛博格将成为后人类时代的主体, 这种融合打破了传统的人与机器、自然与文化、男性与女性等二元对立的界限, 为人类的解放和社会变革提供了新的可能性。^[2]进入 21 世纪, 后人类主义在学术界的影响力不断扩大, 涉及的领域也越来越广泛。后人类主义的发展与社会、科技的发展密切相关。社会的变迁和科技的进步不断为后人类主义提供新的研究素材和思考方向, 而后人类主义的理论探索也反

作者简介: 杨海涛 (2000—), 男, 天津外国语大学英语笔译专业在读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

过来影响着人们对科技发展的态度和对未来社会的设想,推动着社会 and 科技朝着更加符合人类长远利益的方向发展。

2.2 后人类主义的核心观点

后人类主义的核心观点围绕着对人类主体观念的变革展开。传统哲学中,人类被赋予了独特的地位,拥有超越其他存在的理性、意识和自由意志,被视为独立、自主且具有固定本质的主体。后人类主义则认为人类主体并非一成不变的实体,而是在与技术、自然以及其他非人类实体的互动中不断演变和塑造的。

后人类主义强调人类与技术的深度融合,认为技术不再是外在于人类的工具,而是成为了塑造人类存在的内在因素。唐娜·哈拉维提出的“赛博格”概念就是这种融合的典型体现。在现实生活中,各种可穿戴设备、植入式医疗设备等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它们不仅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交流互动的方式,甚至影响了人们的生理和心理状态。这些技术的应用模糊了人与机器之间的界限,使得人类的身体和认知能力得到了拓展和增强。这些技术的介入,改变了人类的身体构成和生活体验,使得人类与技术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塑造的关系。

后人类主义重新审视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打破了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强调人与自然的共生性和平等性。人类不再被看作是自然的主宰,而是自然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与其他生物和非生物环境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生态后人类主义认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自然环境的支持,人类的活动应该尊重自然规律,维护生态平衡。过度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导致了生态环境的破坏,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减少等问题日益严重,这些问题不仅威胁着自然生态系统的稳定,也对人类自身的生存构成了挑战。后人类主义呼吁人们转变观念,树立生态意识,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可持续发展。^[3]

三、传统译者身份的界定与特征

3.1 译者身份的传统认知

在传统译论中,译者的角色定位往往处于一种相对边缘和从属的地位。“隐身人”和“奴仆”则是两种较为典型的代表。

“隐身人”这一比喻,强调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尽可能地隐藏自己的存在,使译文如同原文的直接呈现,而不留下译者个人的痕迹。这种观点认为,理想的译文应该是透明的,读者通过译文能够直接接触到原文作者思想和意图,而不会察觉到译者的介入。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在其著作《译者的隐身:一部翻译史》中,对这种传统的译者“隐身”观念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他指出,在西方翻译史上,从古典时期到现代,译者的隐身一直是一种主流的翻译规范。在这种规范下,译者被要求遵循原文的语言形式、风格和文化背景,尽可能忠实地再现原文,而自己的个性、风格和文化背景则被压抑和忽视。这种做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译文的可读性,但也使得译者的创造性和主体性难以得到充分发挥。^[4]

“奴仆”这一比喻则更加直接地体现了译者在传统观念中的低下地位。译者被视为原作者的仆人,其职责仅是忠实执行原作者的指令,将原文的内容准确无误地传达给读者,而不能对原文进行任何形式的改动或创新。这种观念将译者置于一种被动、从属的地位,完全否定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在传统的翻译批评中,译者如果对原文进行了过多的阐释或发挥,往往会被指责为不忠实于原文,违背了翻译的基本原则。这种对译者的严格限制,使得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缺乏自主性和创造性,难以展现自己的才华和个性。

传统观念对译者身份的束缚,主要源于传统译论往往强调翻译的忠实性原则,将忠实于原文视为翻译的首要目标。传统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将原文与译文、作者与译者视为相互对立的关系,认为译者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准确地复制原文,而不能对原文进行任何形式的干预。这种思维模式忽视了翻译过程中的动态性和创造性,将翻译简单地看作是一种语言转换的机械行为。传统的文化观念也对译者身份产生了影响。在一些理论中,原作者被视为权威和神圣的存在,其作品具有不可侵犯的地位,而译者则被认为是次要的、辅助性的角色。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译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很难得到认可和尊重。^[4]

传统译论中对译者身份的这些认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翻译的准确性和忠实性,但也限制了译者的发展和翻译研究的深入。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翻译理论的不断演进,人们逐渐认识到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重要性和主体性,开始重新审视译者的身份和角色。

3.2 传统译者身份的主要特征

传统翻译观念中,要求译者准确传达原文所表达的信息,不得随意增减或歪曲原文内容。严复提出的“信、达、雅”,将“信”置于首位,强调译文要忠实于原文的意义;泰特勒在《翻译原理简论》中提出的翻译三原则,其中第一条就是“译文应完全复写出原作的思想”,都体现了对内容忠实的重视。^[5]在风格方面,译者需尽力保留原文的语言风格。对于文学作品的翻译,尤其要注重风格的传达,因为风格往往是作品艺术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情感表达上,译者要准确把握原文所蕴含的情感基调,并在译文中予以恰当的呈现,使读者能够通过译文感受到与原文相似的情感体验。

然而,这种对忠实的过度追求,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译者主体性的受限。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往往需要压抑自己的个性和创造性,以确保译文与原文的高度一致。他们不敢对原文进行过多的阐释或发挥,即使遇到文化背景差异较大、语言表达难以直接对应的情况,也只能小心翼翼地遵循原文的字面意思进行翻译,生怕被指责为不

忠实于原文。传统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将原文与译文、作者与译者视为相互对立的关系，认为译者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准确地复制原文，而不能对原文进行任何形式的干预。这种思维模式忽视了翻译过程中的动态性和创造性，将翻译简单地看作是一种语言转换的机械行为。

3.3 传统译者身份形成的原因与背景

传统译者身份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涵盖了语言、文化、社会等多个层面，同时也受到翻译目的和受众需求的深刻影响，翻译规范和理论的制约也在其中。

翻译目的多种多样。不同的翻译目的决定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侧重点和策略。受众需求也会影响译者的翻译策略。翻译规范和理论在传统译者身份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制约作用。翻译规范是在长期的翻译实践中形成的，被译者群体广泛认可和遵循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取向。不同的翻译规范对译者的行为和翻译策略有着不同的要求。传统的翻译理论也强调译者的忠实性和客观性，认为翻译是一种科学的活动，有明确的标准和方法，译者只需遵循这些标准和方法，就能实现准确的翻译。这种翻译规范和理论的制约，使得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受到诸多限制，难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主体性和创造性。^[6]

四、后人类主义视角下译者身份的消解

4.1 消解的表现形式

在传统翻译观念中，译者处于翻译活动的中心地位，是翻译过程的主导者。他们不仅承担着语言转换的任务，还负责处理文化差异、传递原文的意义和风格。随着后人类主义时代的到来，这种中心地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动摇。

后人类主义强调人类与技术的融合，翻译技术的飞速发展便是这种融合的体现之一。计算机辅助翻译（CAT）工具、机器翻译（MT）系统等在翻译实践中的广泛应用，改变了传统的翻译模式。这些技术能够快速处理大量文本，提供翻译记忆、术语库匹配等功能，大大提高了翻译效率。在一些大规模的文献翻译项目中，机器翻译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初稿，然后由译者进行后期编辑和校对。这使得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核心地位不再稳固，他们与机器共同构成了翻译的主体，形成了一种人机协作的翻译模式。

在全球化背景下，翻译需求日益增长，为了满足市场对翻译速度和成本的要求，部分翻译公司采用了工业化的翻译流程，将翻译任务进行分解，由不同的人员和技术工具协同完成。在这种模式下，译者不再是独立完成整个翻译过程的主体，而是翻译生产线上的一个环节，其中心地位被进一步削弱。

传统译论中，原作者被视为作品意义的权威赋予者，译者的任务是尽可能忠实地再现原作者的意图和风格。后人类主义思潮打破了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使得译者与原作者的界限逐渐模糊。后人类主义强调文本的开放性和意义的不确定性。认为文本的意义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在读者的阅读和阐释过程中不断生成和演变。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不再是原作者意图的被动接受者和传递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和创造者。他们根据自己的理解、文化背景和翻译目的，对原文进行阐释和再创作，从而赋予译文独特的意义。

后人类主义强调译者与文本之间的互动性和创造性。译者不再是文本的被动接受者，而是通过自己的理解、阐释和翻译策略，与文本进行积极的对话和互动，从而参与到文本意义的建构过程中。译者在翻译时会根据目标读者的需求、文化背景和阅读习惯，对原文进行适当的调整和改写，以增强译文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

4.2 消解的内在机制

后人类主义对人类主体观念发起了根本性的挑战。在传统哲学观念中，人类主体被视为具有独特的理性、意识和自我意识的存在，是独立、自主且具有固定本质的。这种观念在翻译领域的体现便是将译者看作是具有明确身份和固定角色的主体，他们在翻译过程中遵循一定的规则 and 标准，努力实现原文意义的准确传递。

后人类主义认为人类主体并非固定不变的实体，而是在与技术、自然以及其他非人类实体的互动中不断演变和塑造的。这种观念打破了传统的人类主体的统一性和稳定性，使得译者的身份也变得更加模糊和多元。随着翻译技术的发展，译者与机器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译者不再是单纯的人类主体，而是与机器共同构成了翻译的主体。这种人机协作的翻译模式使得译者的身份不再是单一的，而是融合了人类和机器的特点，呈现出一种新的形态。

技术的飞速发展是后人类主义视角下译者身份消解的重要驱动力。翻译技术的不断创新和应用，极大地改变了翻译的过程和方式。这些技术的出现使得翻译不再是单纯依靠译者的人工劳动，而是人与机器的协作过程。人工智能翻译技术的出现，进一步模糊了译者与机器之间的界限。人工智能翻译系统能够通过深度学习不断提高翻译质量，甚至在某些特定领域的翻译中表现出超越人类译者的能力。这些翻译技术的发展改变了翻译的过程和方式，使得译者在翻译中的角色和地位发生了变化。译者不再是翻译过程的唯一主导者，而是与机器共同参与翻译，他们的身份也因此变得更加复杂和多元。

五、后人类主义视角下译者身份的重生

5.1 重生的表现形式

随着后人类主义思潮对翻译领域的渗透，译者身份在经历消解之后迎来了重生，呈现出全新的表现形式。译

者角色发生了显著转变,其中“创译者”和“协调者”尤为突出。

“创译者”这一角色强调译者不再仅仅是语言转换的執行者,更是具有创新能力的创作者。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根据翻译目的、目标读者的需求以及自身的理解,对原文进行大胆的创新和再创作。在文学翻译中,译者可能会对原文的叙事结构、语言风格进行适当调整,以增强译文的可读性和文学性。

“协调者”角色则凸显了译者在多元文化交流中的关键作用。在全球化背景下,翻译活动涉及的文化元素愈发复杂多样,译者需要在不同文化之间进行协调和平衡。他们不仅要准确传达原文的文化内涵,还要考虑目标语读者的文化背景和接受程度,避免因文化差异而产生误解或冲突。

译者身份的多元化与动态化是其重生的重要特征。多元化体现在译者不再局限于单一的身份,而是兼具多种角色。译者既是语言的转换者,负责将原文的语言信息准确地转化为目标语;又是文化的传播者,将源语文化的丰富内涵传递给目标语读者;还是翻译技术的使用者,借助先进的翻译工具和技术提高翻译效率和质量。动态化则表明译者身份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翻译环境、翻译任务和翻译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在不同的翻译项目中,译者可能会根据具体需求调整自己的角色和策略。随着翻译技术的不断更新,译者需要不断学习和掌握新的技术,适应新的翻译工作方式,其身份也会相应地发生改变。

5.2 重生的驱动因素

技术进步是推动译者身份重生的关键力量。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在翻译领域的广泛应用,翻译技术得到了飞速发展,为译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机器翻译技术的不断突破,使得翻译效率大幅提高。基于深度学习的机器翻译模型,能够通过海量语料库的学习,快速准确地进行语言转换。谷歌翻译、百度翻译等在线翻译工具,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大量文本的初步翻译,为译者提供了便捷的参考。这使得译者能够从繁琐的基础翻译工作中解放出来,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更具创造性和附加值的工作中,如对译文的润色、文化背景的解释、风格的调整等,从而实现从单纯的语言转换者向创译者的转变。

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使得多元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和融合不断加深。这种文化融合的趋势对译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为译者身份的重生提供了契机。文化融合还促使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更加注重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译者不再是简单地传达原文的文化内涵,而是根据目标文化的特点和需求,对原文的文化元素进行创新和再创造,以实现文化的有效传播。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翻译需求呈现出多样化和个性化的趋势。不同领域、不同行业、不同受众对翻译的要求各不相同,这推动了译者身份的转变和重生。

5.3 重生后的译者身份特点与优势

译者主体性在翻译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这是重生后的译者身份的显著特点之一。在传统翻译观念中,译者的主体性往往受到诸多限制,他们被要求尽可能忠实地再现原文,而自身的个性、风格和创造性则被压抑。在后人类主义视角下,译者不再被视为原文的被动传递者,而是翻译过程中的积极参与者和创造者。

重生后的译者身份对翻译生态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传统翻译模式下,翻译生态往往呈现出一种单一、不平衡的状态,译者的作用相对局限,翻译市场也存在着一些不合理的现象;译者身份的转变促使翻译行业的多元化发展。随着译者角色的多样化和翻译需求的个性化,翻译行业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文学翻译和商务翻译领域,而是拓展到了更多的领域。不同领域的翻译需求吸引了更多具有专业背景和技能的译者加入,促进了翻译行业的专业化和多元化发展;译者与其他翻译主体之间的关系更加和谐。在人机协作的翻译模式下,译者与机器翻译系统、翻译软件等非人类翻译主体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协作、相互补充的关系;译者在翻译生态中的引领作用日益凸显。作为翻译活动的核心主体,译者可以通过自己的翻译实践和翻译理念,影响和带动整个翻译生态的发展。优秀的译者可以树立良好的翻译榜样,推动翻译行业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建设;他们还可以积极参与翻译研究和翻译教学,培养更多优秀的翻译人才,为翻译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人才支持。

六、译者身份消解与重生带来的影响

6.1 对翻译理论发展的影响

后人类主义视角下译者身份的消解与重生,从对传统翻译理论的挑战,到新翻译理论的构建方向,再到翻译研究范式的转变,都呈现出全新的态势。新的翻译理论需要充分考虑人类与技术的融合,将人机协作纳入翻译理论的研究范畴。新的翻译理论还需要关注译者身份的多元性和动态性。翻译研究范式也因译者身份的变化而发生了转变。传统的翻译研究范式注重文本分析和语言转换技巧,关注原文与译文之间的对等关系。随着译者身份的消解与重生,翻译研究范式逐渐向跨学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翻译研究开始融合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翻译研究的对象也应从单纯的文本扩展到翻译过程中的各个要素。

6.2 对翻译实践的影响

在传统翻译实践中,译者主要依赖自身的语言能力和文化知识进行翻译,翻译策略相对单一。随着后人类主义时代的到来,翻译技术的广泛应用为译者提供了更多的翻译策略和方法选择。机器翻译技术的发展使得译者可以采用人机协作的翻译策略。在翻译一些大规模的文本时,译者可以先利用机器翻译快速生成初稿,然后根据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审美判断对译文进行校对和润色。译者可以根据具体的翻译任务和需求,灵活运用这些工具,选择合适的翻译方法。

翻译行业的发展也面临着一些挑战。随着机器翻译技术的不断进步,一些简单的翻译任务可能会被机器所取代,这对传统译者的就业造成了一定的压力。翻译市场对译者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译者需要具备跨学科的知识和技能,不仅要精通语言,还要了解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翻译行业还需要加强行业规范和标准的制定,促进翻译市场的健康发展。

七、结论

本研究从后人类主义视角剖析译者身份的消解与重生,揭示其从单一固定向多元动态的转变规律。这一转变源于后人类主义打破人类中心主义,强调人非人类融合互动,是翻译领域发展的必然趋势,对翻译理论、实践及跨文化交流影响深远。它推动翻译理论向跨学科、多元化转变,革新翻译实践策略与方法,同时为文化传播开辟新路径,促进文化多样性发展。然而,本研究仍存在局限。深度上,对后人类主义在翻译领域的应用机制,特别是翻译技术与译者的复杂互动剖析不足;广度上,主要聚焦文学及部分实用翻译,对新兴翻译领域涉及较少。未来研究可构建更完善理论模型,结合实证,探究翻译技术对译者思维、决策及行为的微观影响,以及译者与技术协作中的角色转变。同时应拓展研究范围,纳入新兴翻译领域,全面考察译者身份变化,完善译者身份研究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 [1] 王宁.后人类时代的来临与后人文主义批评的崛起[J].文艺理论研究,2024,44(06):39-47.
- [2] Donna Haraway. A Cyborg Manifesto[N].Socialist Review,1985(1).
- [3] 葛鲁嘉.后人类主义时代的心理学演进[J].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4,46(05):1-8.
- [4] Lawrence Venuti.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北京,2009:34.
- [5] Alexander Fraser Tytler. 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北京,2007:18-.
- [6] 陈婕.中和翻译视阈下的译者主体性阐释[J].当代外语研究,2024,(03):74-82+95.

The Dissolution and Rebirth of Translator Identity from a Posthumanist Perspective

Haitao Yang¹

¹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Tianjin 300302, China

Abstract: Posthumanism, by criticizing anthropocentrism and emphasizing human-machine integration and pluralistic coexistence, subverts the single identity cognition of translators as "invisible men" or "servants" in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theories. Influenced by the popularization of translation technologies and globalized cultural exchanges, translators have shifted from being the sole center of translation activities to pluralistic collaborative subjects, breaking the traditional binary opposition between authors and translators, as well as original texts and translation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posthumanism, translator identities emerge in new forms such as "creative translators" and "coordinators," assuming multiple roles of linguistic conversion, cultural transmission, and technical application while adjusting dynamically. This promotes the innovation of translation theories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translation practices, while also imposing higher requirements on translators' cross-cultural competence and technical literacy.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nslator identity is an inevitable result of technological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future research should focus on emerging translation fields and the deep interaction mechanisms between technologies and translators.

Keywords: Posthumanism; Translator Identity; Translation Practic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ranslation Technology